

· 读书札丛 ·

《孙子·虚实》篇“以吾度之”语解

王家祥

《孙子·虚实》篇有语曰“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哉？”一些研究者以此作为《孙子》是孙武亲著的证明，以为这段话反映了吴、越之争的历史事实。但是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这段话恰恰相反，以此作为孙臆是《孙子》作者的证明。日本学者斋藤拙堂认为“孙武见吴王，在吴伐楚之前，其时吴王已得见武之十三篇。是十三篇之著述，在此以前情形当为不合。因为作书之时，越国尚小，其兵不应比吴为多。今《孙子·虚实》篇云‘以吴（所引书版本如此，吴当为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哉’，是今之《孙子》，越比吴为强大之证据。又《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吴伐越，为吴越相争之始。而《九地》篇有云‘吴人与越人相恶’是后来吴越相仇怨之证据。因论今之《孙子》当是战国以后之作。又《战国策》名孙臆曰孙子。《史记》列传及自序传根据之以记孙臆之兵法，故谓今之《孙子》一书是孙臆所著。最后结论断定孙臆、孙武毕竟同是一人，武其名，而臆是其绰号”（见武内义雄《孙子十三篇之作者》江侠淹《先秦经籍考》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12月第一版中册，第377页）。国内一些学者也同意这种观点，持有相同或相近的说法。如树人的《〈孙子〉十三篇的时代与作者》一文认为《孙子》十三篇应作于

孙臆，他以这句话证明孙臆于马陵之战后寓居楚国作《孙子兵法》，其年代在公元前334年（见1962年7月6日《文汇报》）。

作者所下结论，本人不敢苟同。但对“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哉？”一语所表现出来的灵感与敏锐却值得我们予以高度注意。

首先，让我提出一个问题：史籍所载孙武献兵书见吴王时，吴国的首要敌人是谁？是楚国，还是越国？为什么作为首要敌国的楚国在《孙子兵法》中不见一词，反倒是一个弱国的越国倒屡次被提出来？可以肯定，当时吴国的首要敌国是楚国而不是越国。吴国首要之敌是楚国，一则是因为吴、晋联盟，吴将楚国列为中原争霸的主要敌人；二则是吴国的重要谋士伍子胥、伯嚭皆为楚叛臣，与楚王有家仇大恨，二人奔吴以来，无年不谋攻楚，是为楚害。楚自昭王既位以来，无岁不有吴害。在此种情景之下，孙子作为伍子胥推荐的武将，不谋伐楚而谋伐越，岂不被人谓为“不知事”吗？

我认为这句话恰恰不能作为孙武亲著的证明，反而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更深层次的信息。“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哉？”不合史书所言的吴、越之争霸的历史背景，简单地说对于当时的吴国而言，不存在越人之兵多于己的问题。《史记·孙吴列传》孙武“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很明确地点明《孙子》十三篇所作的时间。又据《史记·吴太伯世家》云“三年，吴王阖庐与子胥、伯嚭将兵伐楚，拔舒，杀吴亡将，二公子。光谋欲入郢，将军孙武曰：‘民劳，未可，待之。’”由此可知，孙武应在这期间为吴王所用，所谓献兵书“十三篇”也在这时。学术界一般推测是公元前512年，这时的吴、楚攻伐正酣。而此时的吴、越力量对比不应存在越强而吴弱的“越人之兵虽多”的问题。《史记·吴太伯世家》“寿梦立而吴始益大，称王。”越在“允常之时，与吴王阖庐战而相怨伐”。阖庐即位，“吴光新得国。而亲其民，视民如子，辛苦同之，将用之也”（《左传·昭

公三十年》)。“夫阖庐口不贪嘉味，耳不乐逸声，目不淫于色，身不怀于安，朝夕勤志，衅民之羸，闻一善若惊，得一士若赏，有过必悛，有不善必惧，是故得民以济其志”（《国语·楚语》）。其时吴国国力强盛，连年打败强大的楚国，使楚国疲于奔命。而越国此时不过是吴国的附属国，吴、越正是“吴强越弱”。故如果承认《史记·孙吴列传》所言“子之十三篇”的话，则显然不合乎历史事实；如果从历史事实出发则不应有“子之十三篇”一说。

也有学者认为承认孙子献书十三篇一说不确，但我们不能否认《孙子》为后学弟子所辑录先生所言，故将孙子在其它场合所言收录其中，所谓“越人奚多”乃是在其它几次伐越战争中所言。根据文献所载：孙子所经历与参与的吴、越之间的战争，一是《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夏，吴伐越，始用师于越也。史默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吴乎！’”吴人在不得“岁”的情况下，发兵进攻越国，其一是因为战略上的需要，为进攻楚国扫除后方障碍；其二是其在兵力上确是处于优势，有取胜的把握方可发动进攻。在此之前，吴国多次进攻楚国得手，《左传·昭公三十一年》载“秋，吴人侵楚，伐夷，侵潜、六”。谋入郢。这说明吴国兵力决不会弱于越国，越国兵力不应多于吴国。

一是吴国入侵楚国后，越人乘吴国内空虚，骚扰吴国。据《左传·定公五年》所载，吴国入楚国都城郢之后，越人乘吴师在楚而袭击吴国。孙武之说有可能产生于这段时间，越人已入吴，孙武不应再有越人“奚益于胜”之说。《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吴使别兵击越”，“吴王留楚不去，夫概亡归吴而自立为吴王。阖庐闻之，乃引兵归，攻夫概”。可见，吴王并没有把越人的进攻放在眼里，当然也就不会产生“越人虽多”之忧，否则他也不会留楚不去。如果真是因为孙武之说而使吴王放心留在楚国的话，那么孙武说此话只有两种可能，一是与夫概有某种关系，为其作掩护。如果是这样的话，孙武不可能留在吴国，而其推荐者伍子胥必然受到牵连，成为其后的杀身之祸的罪行

之一，应见于文献所及。二是孙武判断失误，后学弟子将其录入《孙子》之中是不合乎情理的。

孙武最后见于文献是《史记·伍子胥列传》“阖庐使太子夫差将兵伐楚，取番。楚惧吴复大来，乃去郢，徙于都。当是时，吴以伍子胥、孙武之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左传·定公六年》所载与《史记》所载不同，其时应在公元前504年，以后吴、越之战，因无文献证据不应再扯上孙子，推测之辞暂且不论。

由此可见，《史记·孙吴列传》是有问题的。司马迁当然不是无根据的乱说，他写《孙子传》是有所本的，这个本就是今天我们所见到的银雀山汉简《见吴王》所言“十三篇”。这一点在简本《孙子》出土时已有人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可参看常弘《读临沂汉简中的孙武传》（《考古》，1975年第四期第210至212页）。“虽然，断简残简难见全貌，但已证明它较《史记》、《吴越春秋》的记载详细些，后二者可以看作依据古本取其大要。”所谓孙子献书十三篇应该说据此而来。《孙武传》不是孙武亲著是可以肯定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将其定名为《见吴王》），它是后学弟子依据传说而整理的记录本，是“孙氏之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载孙武之事当然有夸饰之词。所谓亲献吴王十三篇之说也不过是后学弟子为了抬高自己学派地位的夸张之说，这在当时是常用的一种话语方式，言“治道”托黄老；说“仁义”祖孔子。不过我们证明了“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哉？”所言者与年代，也有利于间接地证明所谓《孙子》十三篇亲著之说不能成立。

我认为“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哉？”不是反映的春秋末期吴、越争霸时的历史背景，而是反映战国时代齐威王之时，越国国王无彊准备伐齐国时的历史背景与事实，所言者并非孙武，而是孙臧。它不但不能证明《孙子》十三篇是孙武亲著，反而证明孙武亲著十三篇一说不能成立，当然也不能由此证

明是孙臆所著，而是证明孙臆整理了《孙子》，使之成为十三篇。这就是《孙臆兵法·〈田忌问垒〉》所言的“孙氏之道，明之于吴越，言之于齐”，太史公所言“孙子臆脚，兵法修列”。

越在勾践称霸后，国势遂衰，然并没有停止向中原扩张的行为，至战国中期越王无疆时，曾一度为齐、楚大国之害。《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云“王无疆时，越兴师北伐齐，西伐楚，与中国争强，当楚威王之时，越北伐齐”。越伐楚，正是楚威王时，据《楚世家》：“威王七年，齐田婴欺楚，楚威王伐齐，败之于徐州。”徐广曰：“时楚已灭越而伐齐也。齐说越令攻楚，故云齐欺楚”。楚威王正与齐威王同时，孙臆这时正活跃在政治与军事舞台上。《史记·孙吴列传》曾载“威王问兵法，遂以为师”。齐国对越国的进攻，采取了“伐谋”策略，派使者游说越王，将祸水引向楚国。“齐威王使人说越王曰：‘越不伐楚，大不王，小不伯。’‘楚三大夫张九军，北围曲沃、於中，以至无假之关者三千七百里，景翠之军北聚鲁、齐、南阳，分有大此者乎？且王之所求者，斗晋、楚也：晋、楚不斗，越兵不起，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此时不攻楚，臣以是知越大不王，小不伯。复雎、庞、长沙，楚之粟也；竟陵泽，楚之材也。越窥兵通无假之关，此四邑者不上贡事于郢矣。臣闻之，图王不王，其敝可以伯。然而不伯者，王道失也。故愿大王之转攻楚也。”（齐国使者所言“楚三大夫张九军，北围曲沃、於中”一事似有争议，蒋天枢先生在《“楚灭越在怀王二十三年”说评议》一文可参考，见《文史集林》人文杂志社丛刊第四辑。）然而，楚、齐徐州之战则基本形成共识。无疆争霸，颇为滑稽；齐国使者的游说，一派战国纵横家之风，紧紧抓住越王企图称霸的心态，以三寸不烂之舌使齐国避免了一次战争。而越王无疆争霸的结果落得国破身死的下场，成为军事家“慎战”的一个事实根据。越国攻齐，齐威王必定要与谋臣商量，“上兵伐谋”，“其次伐兵”。齐国在实施“伐谋”战略的同时，也作好战争准备是在情理

之中的，“以吾度之，越人之兵奚多，又何益于胜哉”就是孙臆分析越国兵力时所语。《虚实》篇虽经后人整理，具有高度的抽象特征，已经很难看出其具体所指，如果仔细研读还是可以看出一些原意的，如“我专而敌分”，“千里而会战”，“敌虽众，可使无斗”语，都并非无的放矢，而是对齐、越之间的兵情军势分析而言的。不然的话，我们就会感到“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哉”不知所云，只能以错简来掩饰我们的无奈了。

齐国的“伐交”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据《史记·越世家》载“于是越遂释齐而伐楚。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史记》中华书局版，第1751页）越服于楚，对齐仍有威胁。及至齐湣王时，苏秦劝齐湣王绝秦而攻赵，仍云“秦虽强，终不敢出塞溯河，绝中国而攻齐，楚、越远，宋、鲁弱，燕人承，韩梁有秦患，伤齐者必赵。”（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八·苏秦谓齐王章》，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第27页）苏秦所说应在齐湣王时，此时离“徐州之战”已近50年了，可见越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对齐国有威胁。越国灭国则直至秦始皇统一中国。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越准备伐齐的年代究竟是什么时候？其时孙臆在不在齐国？

楚国出兵攻打齐国，爆发的历史上楚、齐徐州之战的年代，一说是魏惠王二十四年。据《古本竹书纪年》载：魏惠王十三年，齐威王立。十四年，“于粤子无颢薨”，《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索引》按《纪年》：“粤子无颢薨后十年，楚伐徐州”。又按《纪年》所载：“十七年，齐田期伐我东鄙，战于桂阳”，二十八年，与齐田盼战于马陵。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孙臆皆是参加者，既见于《史记》，又见于《孙臆兵法》的《禽庞涓》、《〈田忌问垒〉》篇。如果从此说，则孙臆之说应在公元前344年前后，桂陵之战后，马

陵之战前，正是孙臆在齐国的政治、军事上的活跃期，齐国君臣时常与孙臆讨论“兵法”，是言为孙臆所言顺理成章。一说在周显王三十六年，即公元前333年。李学勤先生在《关于楚灭越的年代》一文中认为：“楚破齐于徐州，是战国史上一个重要的关目。《越世家》集解引徐广说这件事是在周显王四十六年，是不对的。《六国年表》记楚围齐于徐州，是在周显王三十六年，并非四十六年。这件事还见于《战国策·齐策一》‘楚威王战胜于徐州’章以及《魏策一》、《齐策四》，据策文推求，也合于显王三十六年，即公元前333年。楚败越也就在这一年。”（李学勤《江汉论坛》1985年第7期第57页）杨宽先生的《战国史》亦持此说。缪文远先生《战国策考辨·齐策一》也认为是周显王三十六年，魏人败于马陵之战后所发生的事情。

如果从此说，那么孙臆在楚、齐徐州大战是否在齐国则是一个问题。按《战国策》载，马陵之战后，孙臆曾劝说田忌攻成侯，田忌不从，果不入齐。《说苑·尊贤》说楚、齐徐州之战，田忌为楚王出谋画策。《楚世家》曰“齐田婴欺楚”徐广云“齐说越令攻楚，故云齐欺楚”，说越释齐而攻楚应是田婴所为。邹忌排挤田忌后，田婴曾一度为相。钱穆先生《先秦诸子系年·八五·田忌邹忌孙臆考》云“后忌终奔楚。孙子既断其两足，为废人，常客田忌所，疑当与忌同奔。后杜赫为邹忌说楚王封田忌于江南，则孙子亦随至江南矣。及田忌返齐，孙子同返与否不可知”（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中华书局，1985年10月第1版263页）。钱穆先生又推测孙武与孙臆实是一人，臆是《孙子兵法》的作者，作于吴。这一说恐怕难以成立。树人在《〈孙子〉十三篇的时代与作者》一文中认为田忌出走楚国，封于江南，按孙臆与之关系很可能随之流亡，晚年寓居于楚。而在楚国作《孙子兵法》，“以吾度之，越人之兵奚多，亦何益于胜哉”正反映了越人攻楚时，孙臆对楚国的敌对国越国的预卜。他将这句话作为孙臆著《孙子兵法》的一

个证据（引文同上）。不过根据《孙臆兵法·威王问》所载孙臆在齐国还有弟子，这些后学弟子既然在孙臆之后仍然活动在齐地，并且将老师所言整理成集，孙臆应终老于齐国，马陵之战出走楚国的可能性不大。《孙臆兵法·〈陈忌问垒〉》篇云孙氏之道“明之吴越，而言之于齐”，清楚地说明《孙子兵法》应是在齐国整理成篇的。《孙子兵法》和《孙臆兵法》在齐地出土，说明这个学派主要活动于齐地，这正象《老子》在楚地出土，说明《老子》这一学派出自楚国一样。据《汉书·司马迁传》载《报任安书》曰：“孙子臆脚，兵法修列”又云“孙子断脚，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垂空文以自现”，其说与《史记·孙吴列传》不同，《史记·孙臆传》谓孙臆与庞涓俱学兵法，为涓所诱以致魏而臆脚，于是至齐，为齐威王所用，大胜魏于桂陵、马陵，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不存在“终不可用”问题，“终不可用”一说应另有它因。《汉书·刑法志》又云：“吴有孙武，齐有孙臆，魏有吴起，秦有商鞅，皆禽敌立胜，垂著篇籍”，“孙、吴、商、白之徒，皆身诛戮于前，而国灭亡于后”。综合所言，田忌出走楚国以后，孙臆并未出走，而是被齐王处以臆脚之刑，后终身不复起用，终老于齐。《孙子列传》中所载孙臆为庞涓所诱至魏国臆脚，恐是传误。《孙子兵法》应整理于此时，所谓“孙子断脚，终不可用，退论书策”应指此事。“退论书册”不仅是“修列兵法”，还进行教学活动，与学生论兵谈策，“越人虽多，亦奚益于胜哉”也可能是在这种情况下所说的，后由学生整理记录下来的。那么“越人之兵虽多”一语应出现于越伐齐，即楚齐徐州之战爆发之年，即公元前333年。

再说，越国无疆争霸中原及至被楚所打败，前后大约经历了十余年，“王无疆时，越兴师北伐齐，西伐楚，与中国争疆”（《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越王扬言伐齐，完全有可能发生在马陵之战期间。齐人说越人释齐以攻楚，正反映了其避免两面受敌

的战略需要。如此说来，孙臆之说应在马陵之战期间。而在之前，他“修列”了《孙子兵法》而并非是著《孙臆兵法》（拙文《从〈战国策〉所见〈孙子〉看〈孙子兵法〉的形成》有详细论述，待刊）。后学及他人将其说窜入《孙子兵法》之中。而今本《孙子兵法》则肯定晚于马陵之战后，它又经过孙臆的后学及他人的整理（如秦代兵家和汉初韩信与张良整理）。它是在孙臆整理兵法的基础上形成的。而这句话只不过是其证据之一罢了。总之，“越人之兵虽多”一说出现年代应在马陵之战之间。今本《孙子》的出现应在其后。

本文中提出的关于“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哉”的考证正是为了证明《孙子兵法》的成书的年代、形式。它说明孙臆确是整理了《孙子兵法》，而今本《孙子兵法》则是其后学弟子在孙臆整理的基础上形成的，它肯定包括有孙臆的军事理论与思想，它始于春秋末期的孙武，而整理于战国中期的孙臆及后学。故《孙子兵法》应看作是吴孙子与齐孙子的共同结晶，是春秋战国时人军事智慧的最高体现。

作者工作单位：宜昌市委党校《三峡学刊》编辑部

试析“如五器，卒乃复”

胡玉娟

《史记·五帝本纪》中有一段话记述舜帝东巡事迹：